

以色列游说集团 与美国对外政策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JOHN J. MEARSHEIMER, STEPHEN M. WALT

[美] 约翰·J. 米尔斯海默 斯蒂芬·M. 沃尔特 著
王传兴 译

东方
编译
所译
丛

502/02

以色列游说集团 与美国对外政策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JOHN J. MEARSHEIMER, STEPHEN M. WALT

[美] 约翰·J. 米尔斯海默 斯蒂芬·M. 沃尔特 著

王传兴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美)约翰·J.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美)斯蒂芬·M.沃尔特(Stephen M. Walt)著;王传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ISBN 978-7-208-15752-1

I. ①以… II. ①约… ②斯… ③王…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以色列 IV. 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1482号

责任编辑 王冲

封面设计 小阳工作室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美]约翰·J.米尔斯海默 斯蒂芬·M.沃尔特 著
王传兴 译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3.75
插页 4
字数 528,000
版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5752-1/D·3385
定价 98.00元

作者简介

约翰·J. 米尔斯海默 国际关系著名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R. 温德尔·哈里森杰出贡献政治学教授、国际安全政策项目的联席主任，进攻现实主义流派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大国政治的悲剧》《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与沃尔特合著）等。

斯蒂芬·M. 沃尔特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教授。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士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联盟的起源》一书是作者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其他的著作有《革命与战争》（1996年）、《驯服美国的实力》（2005年）、《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与米尔斯海默合著）等。

译者简介

王传兴 复旦大学法学博士，同济大学外交学系教授，2007—2008 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14—2015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富布莱特访问研究学者，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美国政治与美国对外战略、国际关系理论、权力关系与国际体系变迁、北极政治与安全等。

中文版序言

对于那些不熟悉美国政治制度如何运作的人来说,要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是困难的。由于美国是一个多元主义的民主国家,因此人们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权利得到了保证。美国还拥有—一个分权政府——权力由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分享,以及一种运作起来成本高昂的选举制度,在这种选举制度中,个人和组织被允许向政治家和政党进行大量的竞选捐助。

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中,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或“游说集团”自然而然地将在关键议题——其中包括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上对政府施加影响。这种制度也为这些团体提供了众多使其如愿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途径。这些途径包括:它们可以捐助支持自己议程的政治家竞选,直接游说立法人员和行政部门的官员,或者通过对媒体组织施压或撰写推动其特定政策偏好的著述来塑造公众舆论。在美国,这一切活动都是人所共知的合法政治参与形式。

考虑到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性质,即便是那些相对较小的团体,如果它们强烈地关注某一特定议题,而其他人士对此不是很关心,那么它们也能够对政策过程施加重大的影响。当针对这些规模虽小但却集中关注特定议题的团体的反对力量非常弱小或者并不存在的时候,当这些团体的成员受过良好教育、富有且善于组织、政治上又非常积极的时候,其影响力甚至会进一步得到加强。

本书考察的乃是所谓的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该集团是一个由个人和组织所构成的松散联盟,它们积极地进行着维持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特殊关系”的活动。具体而言,以色列游说集团试图确保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广泛的物质和外交支持,并且是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游说集团还

试图使美国的政治家和媒体不敢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进行批评,并确保美国在处理中东政策的其他方面时顾及以色列的利益。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华盛顿最有权势的利益集团之一。然而一直到最近,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部门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公开谈论其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事实上,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在推动这一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在美国是一个禁忌性的话题。即便在“9·11”恐怖袭击为美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令人困惑的立场提供进一步的事实之后,情形也是如此。

我们两位作者决心要挑战这一禁忌,而最好的挑战方法就是拿出一份仔细的研究报告,解释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如何运作的,并对它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描述。我们所作努力的最初成果是2006年3月在《伦敦书评》上发表的一篇冗长文章,该文不仅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而且引发了大量的争议。为进一步推动这一讨论和更加完整地陈述我们的观点,我们决定将文章中的观点扩展成一本著作,该书随后在2007年9月出版。从一开始,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鼓励对华盛顿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进行更公开的讨论,并证明美以之间更加正常的关系对两个国家都将更加有益。

我们所作的努力取得成功了吗?虽然美以“特殊关系”的辩护者对我们起初的那篇文章和随后的这本书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对我们俩进行了毫无根据的人身攻击,但是我们还是要就人们对我们所做工作的总体反应表达感激之情。本书上过《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已翻译成17种语言,在20个不同国家以及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出版。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有关美国的以色列政策、美以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本身这些问题,美国的公众话语现已公开多了。新闻记者、学者,甚至某些政治家现在都公开谈论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而且当涉及以色列的时候,有关美国中东政策正确路线的真正辩论已经变得更为普遍了。

进而言之,有迹象表明,一方面以色列游说集团本身可能也在朝我们所建议的方向演变;另一方面美国可能正缓缓地朝一种同以色列更为正常的关系方向前进。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们所表达的希望是,一方面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温和派团体将变得更加活跃和更具影响力;另一方面美以之间“特殊关系”的强硬派辩护者将开始认识到,美国对以色列的无

条件支持对两个国家都是有害的。

这些情况似乎正在发生。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温和派团体——以色列公共政策论坛和为了现在和平的美国人——正变得更加活跃和直言不讳，一个推动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和更平衡的美国中东政策的亲以色列新游说组织——名为J街(J Street)——成立了。虽然这些团体具有强烈的亲以色列倾向，但是它们相信，美国应该趁早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拿出一项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否则就来不及了。虽然奥巴马政府肯定支持它们的观点，但白宫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的以色列支持者是否支持奥巴马总统，取决于它们是否支持以色列使西岸地区殖民化的努力，取决于它们对以色列自身同巴勒斯坦人之间达成和平成为不可能而花费的气力持支持的态度。

虽然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未虑及中国，但是我们的分析对未来的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却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维持美以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将使美国陷身于中东，这样美国就不能够集中关注亚洲。事实上，华盛顿在亚洲有时候将不得不求助于中国提供帮助，就像最近在应对朝鲜核问题时所做的那样。美国肯定将向台湾施压让它别惹麻烦，因为美国在如此深地卷入中东之际，是不能够应付在亚洲发生的危机的。美以之间的“特殊关系”，也使得美国同众多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使得美国同伊朗之间更可能爆发一场冲突。这些情形将促进中国赢得朋友的努力，扩大中国在石油丰富的波斯湾地区的影响力。

因此，那些担心美中注定要成为对手的读者应该希望，以色列游说集团继续成功地捍卫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因为这一政策有利于中国。

米尔斯海默

沃尔特

2009年8月1日

前 言

在一切的事务当中,不时地对你长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打上一个问号,那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2002年秋,《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邀请我们两位作者撰写一篇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特写文章。我们俩有些保留地接受了这一委托,因为我们俩知道,这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而且任何对这一游说集团、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或者对以色列的政策本身进行追根究底细查的文章,都可能激起严厉的反应。然而,我们却感到,人们再也不能够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了,特别是在考虑到“9·11”的恐怖袭击和令人忧虑的伊拉克战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果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中东的反美主义以及美国与其主要的战略盟友之间关系紧张的重要根源的话,如果亲以色列的团体和个人是对美国在这一至关重要地区的外交政策的一股主要影响力量的话,那么公开提出这一问题并鼓励对这一游说集团的行动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公开的讨论,就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在随后的两年里,我们两位作者时断时续地撰写这篇文章,并且与《大西洋月刊》的编辑们保持紧密的合作协调。2005年1月,遵照先前的合同,在其中几乎加入了编辑们的所有建议,我们将一份手稿寄给了他们。令人吃惊的是,几个星期过后,文章的编辑通知我们说,《大西洋月刊》已决定不采用这篇稿件了,说他对我们打算修改这篇文章不感兴趣。

我们考虑过将这篇文章送交给其他几家刊物,但是得出的一个结论

却是，他们不可能采用这篇稿件，原因既在于它的内容，又在于它的长度。我们也曾考虑过将这篇文章扩展为一部专著，但是人们对我们刚开始的研究所作出的反应，不足以使我们有热情说服自己去额外地耗时、耗力做这件事情。因此，我们将文章的手稿搁在了一边，转而去忙其他的项目。虽然如此，这份材料的缩写版，却已纳入了斯蒂芬·M.沃尔特(Stephen M.Walt)所著的《驯服美国权力》(*Taming American Power*)一书当中，该书于2005年由诺顿(W.W.Norton)公司出版。

随后，在2005年10月，有位著名的美国大学教师与我们联系，并建议我们应考虑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这篇文章。《大西洋月刊》给了这位教师一份这篇被拒文章的复印件，他告诉我说，《伦敦书评》的编辑玛丽-凯·威尔默斯(Mary-Kay Wilmers)会对这篇文章有兴趣。我们将手稿寄给了她，她很快就表达了发表这篇文章的愿望。经过另一轮的更新修改后，被冠以《以色列游说集团》(*The Israel Lobby*)的这篇文章，在《伦敦书评》2006年3月23日那一期发表了。由于那些曾阅读过这篇文章较早的草稿、并对之进行过评论的学者们的建议，我们同时将这篇文章的完整版张贴在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员工作底稿(*Faculty Working Papers*)网页上。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伦敦书评》的版式不允许刊出旁征博引的参考内容或注解说明，而我们则要让读者明白，我们的观点是建立在大量广泛的可信资料基础之上的。

文章中提出的论据是直截了当的。在对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程度可观的物质和外交支持进行描述之后，我们认为这种支持并不足以用战略的或道德的理由来加以解释。相反，这种支持基本上是由于以色列游说集团——这是一个由个人和团体组成的松散联盟，其目的是以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式来寻求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政治权力所导致的。除了鼓励美国或多或少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之外，在制定美国的以巴冲突政策、注定要受到惩罚的对伊拉克的入侵、持续地同叙利亚和伊朗保持对峙等问题上，这一游说集团中的那些团体和个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我们认为，这些政策既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又对以色列的长远利益造成了伤害。

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十分令人激动。到2006年7月，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网页记录显示，下载这篇工作底稿的次数达到了27.5万次，而且我们收到了翻译或重印《伦敦书评》上这篇文章的无数请求。正如预期的

那样,文章一开始的时候引发了来自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那些著名团体或个人的猛烈批评,我们两位作者则被“反诽谤联盟”(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专栏作家谴责为反犹分子。《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则用了四篇不同的文章来攻击我们的文章,而且还有许多批评者指责——错误地指责——我们犯了无数的历史事实错误。有几位批评者甚至预言,这篇文章(及其作者)很快就会被世人遗忘——他们认为这是罪有应得。

他们错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读者——既有犹太人,又有非犹太人——出来支持这篇文章。他们并不同意我们文章中的每一个观点,但是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研究考察早就应该进行了。可以预料,来自美国之外的反应普遍都是赞成嘉许的,甚至以色列本身也有一些正面的回应。《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纽约观察家报》(*New York Observer*)、《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和《国家》(*Nation*)杂志上纷纷出现了表达尊敬的评价,而且这场论战最终在一系列的新闻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从以色列的《国土报》(*Ha'aretz*),到美国的“全国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

著名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在其2006年7/8月的一期上为这篇文章组织了一组专题文章,而《华盛顿邮报星期日杂志》(*Washington Post Sunday Magazine*)则在7月就我们提出的问题出版了一个有思想深度的封面专题。当年的夏末,《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的一位评论者,把这篇文章描述为“无懈可击的分析……它可能掀起美国中东政策有益的范式变化”。

在2006年期间,有关以色列和美国中东政策确实在发生变化的对话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而且对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中所起的作用的讨论也容易一些了。当然,这并非全部是我们的贡献;2006年夏,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的那场灾难性的战争、美国在伊拉克灾难性失败的继续、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巴勒斯坦:要和平而非种族隔离》(*Palestine: Peace Not Apartheid*)一书出版后受到的人身攻击、美国和伊朗之间火药味十足的战争言辞,以及明显但并不成功的封杀或诽谤其他批评以色列游说集团者的企图,也使得人们增强了对以色列游说集

团活动和影响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似乎认识到，这一话题需要宣扬，而且有更多的人愿意大胆地说出来。

同样重要的是，那些有思想见地的人开始承认，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AIPAC)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中的其他强硬派团体——其中包括一些大声叫嚷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Christian Zionists)，他们并不代表美国犹太人团体，或者更广泛地说，并不代表美国的主流舆论。有关那些团体所提倡的政策是否符合美国或者以色列利益的辩论变得激烈起来。结果，一些亲以色列的团体开始公开谈论有关均势朝更温和方向变化的需要，而像《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和《纽约时报》这样的著名出版物则发表评论，认为为了双方的利益，是形成新的美以关系的时候了。

对这样的发展我们感到满意和高兴，因为我们当初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促成对这一话题进行更加清醒而开诚布公的讨论。尽管对话刺耳难听、充满对抗，并且有公然的人身攻击，但是依然在进行。可是我们需要写一部专著吗？或许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而这正是转向其他话题的时候。在进行一些思考之后，尽管有些疑虑依然挥之不去，我们却得出一个结论——撰写一部专著将可以在几个方面有助于促进这场对话。

第一，尽管最初的那篇文章对大多数杂志而言是够长的，但是版面篇幅的限制迫使我们略去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在处理一些话题时比我们希望的更加简略。这种不可避免的长话短说，可能导致读者对原来那篇文章产生一些误解，而撰写一部专著将使我们有机会来向读者呈现我们观点中更加详细周到的内容。

因此，这本书包括了对游说集团更加完整的定义、对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所起作用的进一步讨论，以及对随着时间流逝而演变的以色列游说集团更加全面的叙述。我们也对以色列过去和当前的行为——尤其是对巴勒斯坦人的行为——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叙述。我们这样做并非出于任何对以色列或者它在美国的支持者的偏见，或者说是因为我们热衷于夸大以色列的不当行为。相反，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是因为这一话题对一些道德观点而言是重要的，而这些道德观点被普遍地用来为美国例外地支持这个犹太国家所达到的程度进行辩护。换言之，我们之所以集中关注以色列的行为，是因为美国集中关注对以色列的支持达到了超常的程度。我们也提出了充满争议性的双重效忠问题，而这在最初的

那篇文章中并未涉及。

第二,撰写这本书,使我们能够对那些反对我们最初那篇文章的主要批评作出回应。我们在随后给《伦敦书评》以及上面提到的《外交政策》杂志的那组专题文章的两封信中进行了回应,并且逐点对那些针对那篇文章的指控——进行了驳斥[可登录 www.israellobbybook.com, 参见《正确记录:对〈以色列游说集团〉一文批评者的回应》一文]。尽管绝大部分反对那篇文章的指责之词是站不住脚的,就像那些对我们的人身攻击一样,但是存在许多富有思想见地的批评,它们提出了进行阐释和加以强调的重要问题。即便在并非完全被说服的时候,我们也从中受益良多,我们试图在此加以提出。

第三,撰写一部专著,使得为我们的核心主张提供经验上的支持,并进行最新的分析成为可能。不仅有关那些重要事件的额外证据逐渐被大家知道了,如伊拉克战争,而且在最初的那篇文章出现时,其他一些事件——最著名的是2006年7、8月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还未发生。美国对那场战争的反应,进一步说明了那一游说集团的力量,以及它对美国和以色列利益的有害影响。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也可以从美国对伊朗和叙利亚政策的演变中,从前总统吉米·卡特、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以及其他数位批评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行径的著名人士的严词攻击中看得出来。

第四,本书提供了一个机会,讨论美国应该如何在中东推动自己的利益,以及美国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应该如何考虑亲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对于美国人和非美国人来说,赌注同样是很高的,因为中东是一个战略上至关重要但却并不稳定的地区,而美国对那一地区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广泛的回响。就像伊拉克战争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政策被误导,美国能够对自身和他人产生巨大的伤害。这一事实使得认清是什么在驱动美国的政策,并领会到那一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内容,变得更加重要。我们最初的那篇文章并没有给出正面的解决问题之道,但是在本书的结尾一章,则勾画出了美国中东政策的不同方法途径,辨明了应该如何来减小那个游说集团的权力,或使之提出更具建设性的方法。

尽管在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令人鼓舞、进行更加公开讨论的迹象,但是那一游说集团依然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力。自我们当初的那篇文章发表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一地区所面临

的难题并未减少；事实上，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这些难题是进一步恶化了。伊拉克是一个大失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还陷在冲突之中，哈马斯和法塔赫在为控制巴勒斯坦社会而战，真主党在黎巴嫩的作用是个大麻烦。伊朗正在寻求获得对核燃料循环技术的完全掌握，像基地组织那样的团体依然活跃而危险，而工业世界对波斯湾石油的依赖依然故我。这些都是非常麻烦的问题。如果美国不能够就我们在那一地区的利益，以及所有那些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因素——包括以色列游说集团，进行一场文明而又礼貌的对话，那么美国就不能够有效地处理任何或者全部难题。为鼓励对话继续进行，我们写出了这一本书。

在本书的结束之处，我们表达了对众多亏欠过的人的感谢之情，但我们愿意在此提及其中的一位。在超过25年的岁月里，我们一直有幸享受到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美国最为成就卓然的社会科学家中的一位——的友谊和支持。他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好的行为榜样。萨姆总是处理那些重大的问题，而他解答这些问题的方式，是世界其他地方不能够忽视的。在过去的岁月里，虽然我们俩在数不清的问题上与他意见相左，有时候还是激烈而公开的意见相左，而他却从来没有以此来反对我们，而是持之以恒地、通情达理地支持我们的工作。他理解学术研究并不是一种知名度的竞争，他理解对于学术进步和健康的民主来说，勇敢而礼貌的辩论乃是根本。我们对萨姆满怀感激之情，感激他给予我们的友谊，感激他在自己整个的学术生涯中为我们树立的榜样。我们很高兴将此书奉献给他。

约翰·J.米尔斯海默于芝加哥大学

斯蒂芬·M.沃尔特于哈佛大学

致 谢

几乎没有哪个人是独自工作的，我们也不例外。对其他人所给予我们的帮助，我们深怀感激之情，而对他们的帮助致以谢意，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本书的诞生始于《伦敦书评》上的一篇文章，而就像在本书的前言中所叙述的那样，如果不是由于《伦敦书评》的编辑玛丽-凯·威尔默斯的勇气和远见卓识，那篇文章可能不会发表。没有她，这本书是不会存在的。《外交政策》杂志的编辑莫伊塞斯·奈姆(Moises Naim)在该期刊的2006年7/8月一期上，组织了一次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的讨论会。那次辩论使得针对我们那篇文章以及我们俩人本身不理性的攻击的讨论，转向了对这些问题的更严肃考虑，我们赞赏奈姆在处理意见交流中不偏不倚的方式。

我们曾在以下这些场合的陈述发言中，讨论过我们有关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想法：包括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的卡姆以塞亚以色列宗教团体、康奈尔大学、外交关系委员会、波士顿的爱默生学院、乔治敦大学、帝国美术展览馆、国家新闻俱乐部、哈佛大学的尼曼资助研究项目，以及米苏拉的蒙大拿大学。这些会议帮助我们进一步提炼了自己的观点，因而我们要对这些讨论的组织者们表示感激：他们是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拉比·阿诺德·沃尔夫(Rabbi Arnold Wolf)、杰-琼·苏(Jae-Jung Suh)、奈杰尔·吉布森(Nigel Gibson)、拉尼亚·吉布拉维(Rania Kiblawi)、约翰·亨利(John Henry)、莫哈默德·尼摩尔(Mohamed Nimer)、考利·克罗斯利(Callie Crossley)、理查德·德雷克(Richard Drake)。我们也要对众多的会议参加者，以及给予我们批评和建议的人表示感激。

以下的这些人对我们手稿的部分或全部进行过有价值的评论：他们是柯克·J.贝蒂(Kirk J.Beattie,)、哈维·考克斯(Harvey Cox)、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约翰·C.格林(John C.Green)、伊恩·鲁斯迪克(Ian Lustick)、斯蒂文·E.米勒(Steven E.Miller)、特里塔·帕尔西(Trita Parsi)、杰里米·普雷斯曼(Jeremy Pressman)、威廉·匡特(William Quandt)、尤金·罗根(Eugene Rogan)、杰罗米·斯莱特(Jerome Slater)、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马丁·沃尔特四世(Martin Walt IV)、萨拉·利娅·惠特森(Sarah Leah Whitson)。我们要特别提到对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的感谢，因为他在近乎创纪录的长时间里，向我们提供了富有洞见而又非常详细的建议，并且润饰了我们文章中许多粗陋之处。当然，本书中表达的乃是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对任何依然存在的错误承担责任。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芝加哥的瓦伊迪亚娜莎·刚德鲁珀特(Vaidyanatha Gundlupet)和坎布里奇(Cambridge)的保罗·麦克唐纳(Paul MacDonald)两位研究助手的帮助。像往常一样，我们的其他两位研究助手也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是哈佛大学的戴维·赖特(David Wright)和芝加哥大学的索维克·德(Souvik De)。戴维·恩德斯(David Enders)，尤其是马克斯·弗雷泽(Max Fraser)，他们两位细心而快速地对手稿进行了事实的核实，我们感谢他们所作的努力，以及他们在指定的紧迫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的能力。

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代理商比尔·克莱格(Bill Clegg)就是一位精力充沛、富于智慧的支持者；我们非常赞赏他的热情和指导能力。对于他让我们找到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来出版此书，我们感到十二万分的高兴。同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一起工作的经历，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我们对该出版社的出版商乔纳森·加拉西(Jonathan Galassi)，以及出版社其他情绪高昂、具有无穷专业精神的工作人员表示感激。我们的编辑埃里克·钦斯基(Eric Chinski)特别值得赞赏：他的洞察力、他对细微之处的敏感性，以及他那一贯的高标准要求，促使我们写出了一本质量比原本要好得多的书。辛西娅·默尔曼(Cynthia Merman)的编辑校对工作做得棒极了，而吉纳·哈姆肖(Gena Hamshaw)则使这本书的流通工作处理得顺畅和令人高兴。

最后，撰写一本大部头的书，不可避免地要给作者的家人和朋友带来

牺牲。我们两人独自是完不成本书写作的；或者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妻子、子女，以及许多很棒的朋友、同事给予我们的爱和支持，我们两人是完不成本书写作的。对于过去一年中我们毫无疑问曾表现出的那些疏离、分心和易怒的时刻，我们表示歉意；我们感谢你们所有人的耐心。我们欠你们一份人情。